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回忆录丛书

秦基伟回忆录

秦基伟 著

解放军出版社

K825.2/89
:7
2007

秦基伟回忆录

秦基伟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基伟回忆录/秦基伟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ISBN 978 - 7 - 5065 - 5424 - 4

I. 秦… II. 秦… III. 秦基伟(1914 ~ 1997)—回忆录

IV. K82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0345 号

书名：秦基伟回忆录

责任编辑：孙阿冰

装帧设计：阎可钦

出版发行：解放军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100035

电话：66531659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70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280 千字

印 张：25.875

印 数：5000

版 次：2007 年 8 月第 2 版

印 次：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065 - 5424 - 4

定 价：35.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走向革命

童年	1
“马克思鞋”的启示	6
参加黄麻起义	9
当上了“红小鬼”	12

第二章 在战斗中成长

莫名其妙的降职	17
意想不到的提升	21
四战四捷	24
血溅陡坡	40

第三章 转战鄂陕川

追赶队伍	46
立足于巴山蜀水	51
打一次电话上一堂课	53
在川北的几起几落	56

第四章 浴血长征路

雄关漫道	59
“打通国际路线”	63

苦战临泽	66
------	----

第五章 风雪祁连山

冰天雪地里的游击队	74
身陷囹圄	76
智斗马家军	79
归队	82

第六章 奔赴抗日前线

单枪匹马的游击教官	85
成立太谷游击队	90
把队伍拉上太行山	95
“秦赖支队”威震太行	98

第七章 敌后抗战

“桂秦赖三个英雄各自为战”	100
参加“百团大战”	103
勒紧裤带反“扫荡”	106
“格子网”里抓鬼子	113
第一次做外事工作	115

第八章 长缨在手

千军万马下太行	119
进攻进攻再进攻	123
出击平汉线	127
斡旋在谈判席上	136
风云突变战豫北	148
刘、邓对我的教诲	156

第九章 挺进中原

目 录 · 3 ·

渡河南征	162
伊河脱险	170
开辟豫西根据地	177
二克洛阳	183
第十章 解放郑州	
豫西整军	189
郑北歼敌	193
陈老总说:九纵成熟了	205
第十一章 淮海大战	
攻克宿县	211
出击浍河	214
砸碎硬核桃	218
直捣双堆集	226
第十二章 饮马长江	
直出江北	233
江畔厉兵	239
突破天险	246
千里追击	252
第十三章 挥戈华南	
进军两广	261
辗转西南	268
剿匪平叛	272
第十四章 跨过鸭绿江	
请缨入朝	285
对空作战	291

血祭芝浦里	297
坑道里面“打老虎”.....	306
防御平、金、淮	312
第十五章 廉战上甘岭	
难忘的七天七夜	323
艰苦卓绝的坑道斗争	331
大反击	337
话说上甘岭	343
屯兵东海岸	353
第十六章 西南戍边	
离朝回国	357
向毛主席汇报	361
巩固千里边防线	364
再进军事学院	367
同周总理和陈老总相处的日子	370
第十七章 新的考验	
忠言相劝	378
身陷重围 保护阎红彦	379
周总理派来了飞机	381
晾在北京“靠边站”	381
坐上了“喷气式”	383
第十八章 放逐湖南	
深夜传来的“命令”	385
落户西湖	386
种出了 37 斤重的大冬瓜	388
“老秦，你真乐观”	389

目 录 · 5 ·

没有了公民权	390
望断长空“雁”	392
发脾气住进了医院	393
团聚在灰汤	394
重新工作	397
后记	399
附录 秦基伟同志生平	401

第一章 走向革命

童 年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我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区秦罗庄。父亲秦辉显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除了种田，还会一点篾匠手艺。母亲周氏，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除了父母之外，家庭里的长辈还有我的伯父。伯父终身未娶，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同父亲相比，伯父是一个更地道的农民。我的父亲读过几年书，又会点手艺活，田间劳动相对少了些。伯父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

平辈中，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因为是幺儿，父母和伯父对我自然多了些疼爱，哥哥姐姐凡事也都让着三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家庭生活是温暖的，虽然并不富裕，却洋溢着劳动之家纯朴和睦的气氛。

我的家乡秦罗庄，在黄安县的北部，是片风景秀丽的丘陵。村庄坐落在岗坡上，北倚老君山、天台山、雨台山，面向阳台山，西有龙王山，东眺光宇山。四周可谓群峰竞秀。在我家

门前不远处,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溪,常年流水潺潺,春夏之交,梅雨连绵,水涨溪宽,鱼游虾戏,给我们这群乡野伢子带来不少新奇和乐趣。还值得一提的是,这条小溪河往东走,便汇入了稍大一点的盐店河,而盐店河流到七里坪,则融进了纵贯大别山区的倒水河。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倒水河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和摇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就是在七里坪镇倒水河的河滩上成立的。在几十年的腥风血雨中,从倒水河畔走出了一批又一批革命的优秀儿女。

家乡不仅水好,山色也是很美的。

越过村庄南边的小溪,再往前走几十步,就是一座小山坡,与村庄遥遥相对。我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山坡上那大簇大簇的映山红。一到春天,漫山遍野都是。清早起床,打开院门,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沐着朝阳的像云霞一样燃烧的映山红,那情景真是激动人心。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就是这样一方水土养育了我。

到我长到稍明事理的时候,父母和伯父商议,让我去邻村的学校读书。我们庄户人家送子女读书的目标很简单,能识得官府布告,能记个账,春播秋种能算个子丑寅卯就行了,穷人家孩子读书的目的基本上是为劳动服务。

小时候的我是比较顽皮的,生性好动,好奇心强,尤其喜欢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坐在学堂里,摇头晃脑啃书本,感觉很不自在,所以我总是找机会逃学,或到山坡上和放牛的小伙伴们嬉戏,或到附近的河沟里捉鱼摸虾,眼看到了放学时间,才装着放学回家。后来,逃学的事被老师发现了,他罚我下跪,用戒尺打手心。但越是挨罚挨打,我就越不愿上学。就这样,我小学上了不到一年,读过《百家姓》、《三字经》,但终究激发

不起学习兴趣,再加上我的哥哥身体不好,做工种田都显得孱弱,所以经父母和伯父商量,不再勉强我上学,而集中财力保障我哥哥多读几年书。他们的指导思想很明确:我们兄弟两个,一个读书,一个劳动,文武都全了。长辈们希望我和哥也像父亲和伯父那样,永远不分家。

现在想来,那时候真是幼稚,只知道劳动能出成果,哪里知道读书学习会给人带来那么大的益处。就因为小时候没能坚持上学,在此后几十年的生涯中,我在学文化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我记事的时候,家里有八亩水稻田,十来亩坡地。依靠自己的劳动,温饱不成问题,还略有节余。休学之后,我便跟随伯父下田干活。那时候我还不到 10 岁,但没过多久,农活一套我便基本掌握下来,耕田耙地,插秧施肥,渐渐地得心应手。伯父很喜欢我,他觉得我热爱劳动这一点很像他。他常常对我讲,一个人从小就不要偷懒,有力气就要劳动。饭里有了自己的汗,吃起来才格外香。

我的母亲也是非常勤劳能干的,除了在家操持家务,农忙季节一样下田参加劳动。

庄稼人衡量一个孩子低劣优秀的标准,多数要看这个孩子是否爱劳动,劳动得怎么样。这一点,我很快就得到了乡亲们的赞赏。再加之我性格活跃,爱唱爱跳,不腼腆不怯场,所以在村里一般大小的伢子中,我算得上是个“领袖”人物,经常把他们组织起来,模仿戏班子演大戏、或者玩打仗游戏,应该说,过得还是很快活的。那时,我也有痛苦,那就是受着疾病的折磨。我从小有哮喘病,犯起病来,一点不能活动,人躺在这间屋子里,隔壁屋子里的人都能听见我的喘声,找村里、镇里的医生看过,都没看好。一天,村里来了一位牵骆驼的江

湖医生,我母亲请他给我看。他给了六包红色粉状药,让我们找六个绿壳鸭蛋,再从尿缸里刮些尿硷放在瓦片上用火焙干研碎,每天往一个鸭蛋里灌进一包红粉药和尿硷,封住蛋口后把蛋放在火里烧熟后吃。我母亲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在我每天放牛回来后就按这个办法烧个鸭蛋给我吃。蛋的味道是极难吃的,但为了治病,每次我都硬着头皮把它强咽下去。结果,吃完这样六个蛋后,我就真的再没犯过哮喘。我算很幸运,当时我们村子里有三个得哮喘病的人找这位医生治,只有我一人治好了。治病这件事是我人生道路上非常重要一步。如果哮喘病治不好,我就不能参加红军,踏上革命的征程。

我的病治好了,全家都很高兴。可是,没想到,紧接着却是一连串的不幸袭击我家。

由于连年灾荒,地处大别山腹地的黄安县,瘟疫流行。我十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那时候根本谈不上医疗。母亲至死也不知道自己患的是什么病。丧母之痛尚未平息,第二年,我的父亲和伯父也相继撒手离开了人间。眼泪还没哭干,我的哥哥又于第三年病故,而姐姐又已经出嫁。

亲人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如同一阵又一阵的晴天霹雳,抽打在我幼小的心上。如今回过头来想那几年,有时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一个12岁的孩子,孤独一人,居然活下来了,并且独自担起了一个家庭的全部责任。

祸从天降,这对自己的成长既是沉重的打击,也是一次很大的磨练。死的已经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活着的还要在生活的路上坚定地往前走下去。

短短几年,我像长大了十几岁。

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偌大的一个家,只剩下我一个人,

白天还好过，一把铁锁挂上门，我操起家伙下田去，农忙时还和别家换工。夜里就难熬了，我家住在山坡靠山根的地方。庄户人家老鼠多，到了夜深人静，便是老鼠的天下，一群一群绕着房间吱吱乱叫。鬼妖神怪的传说听过不少，老鼠一叫，就瞎联想，仿佛真的看见青面獠牙的鬼怪，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想打不敢打，想逃逃不掉，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用被子把脑袋蒙起来，在心理上多了些安全感。一睡着，那就什么也不怕了。

当初，我家长亲都健在的时候，衣食自给，并有节余。因此父母和伯父在村里说话都有一定威信。可是如今撑梁柱都散了，可以说人亡家破，全家只剩下我一个小孩子，百事不懂，丧事办了一大串，田也大部分卖了，家也空了，还欠下一连串的债务。

家道一落千丈，三里之外都能看见房顶上呼呼直冒的穷气。这样一来，过去那些亲热的笑脸就很少见了，连故亲远戚都少了来往。话又说回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乡亲们都是穷人，自己糊口尚且勉强，谁有能力收养我这个一身债务的穷小子呢？

我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儿。

过去，大人都在，我最盼着逢年过节。因为逢年过节有好东西吃，还有赏钱，村里镇上还可能有演大戏的。乡下伢子们最幸福的时光，莫过于过年过节。可是，自从亲人们一个个离我而去后，我最怕过年过节，怕听爆竹声，怕见别人家的灯光。

从前，我曾听老人说过，人死之后灵魂要升天。我常常在心里想，我的父母会在天上看见我在受苦，会从天上走下来看我，可是这种奇迹却从来没有发生。

“马克思鞋”的启示

由于家庭的变迁，使我提前结束了儿童少年生活。从11岁开始，我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命运对我来说实在是过于残酷了。然而，苦难打不垮人，却能造就人。我不敢说苦难如何造就了我，但苦难确实没有把我打垮，反而使我在意志和胆量方面得到了很大的磨练。同时也迫使学会了基本的谋生手段。

成为孤儿最初的日子里，我想的最多的当然是我的父母。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父母死而复生的稚想也一天天淡下去。处在一个贫困孤儿的位置上，我想的问题要比别的孩子多得多。我不仅要把劳动和过日子的一系列问题想得周全，同时我的思路还能触及到一些简单的社会问题，譬如，为什么有些人过去对我家很好而如今却对我冷眼相待？同样是人，为什么有穷有富？有时候心里想，这个世道不公，应该改变。至于怎么改变，自然心里是不明白的。

说到这里，就要回顾一下故乡的政治风貌了。

湖北省黄安县，是中国革命的最早策源地之一。早在“一大”之前，酝酿成立“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的倡导者就是黄安人董必武。在我整个青少年生涯中，黄安县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

10岁那年，我听村里的人摆龙门阵，说是县城里学生乱哄哄地起事了，要造地主土豪和军阀的反。又说县城里大街小巷都贴着两幅画，一幅是蓄鹅头的画像，一幅是蓄平头的画像。蓄鹅头的像是个姓列的俄国人，叫列宁，他帮助中国穷人。蓄平头的是个日本人，叫帝国主义，他提出“二十一条”，

要灭中国。

我们这些伢子虽然不懂更多的道理，但我们是中国人这一条是不含糊的，爱国之心是与生俱有的，正义感也是与生俱有的。我们从心眼里爱戴那个姓列的俄国人，而痛恨那个名叫帝国主义的日本人。并且在心里暗暗使劲：狗日的小平头，要是到秦罗庄，让我撞见了，非唾他一脸唾沫不可！

随着外面世界革命浪潮的不断兴起，乡下也开始动荡起来。或许是早当家的缘故，我比别的孩子又多了一份机灵。我敏感地发现，村里的一些大人除了忙着种田以外，还忙着别的什么事情，神秘兮兮的。我还注意到家乡一带，偶尔会出现几张陌生的面孔，他们总是那么行色匆匆。

我隐隐约约地预感到，要发生什么大事情。一天清晨，我照例同几个小伙伴一起到对面山坡放牛。在路上我们发现了一件让我们惊奇不已的事情。

头天夜里下了一场雨。我们家乡是红沙地，雨水一浸，又板实又平滑。我们就在这又板实又平滑的路面上看见了一些奇怪的鞋印，里面有弯弯曲曲的图案，经络非常清晰。这种鞋印，绝不是我们家乡那种线纳的、麻搓的鞋底踩的，过去我们根本没见过。

可以肯定，这样的鞋印是有来头的。

后来，我们从路边，从草棵里，从盐店河畔又发现了许多这样的鞋印。还有一些标语贴在墙上，写的是“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之类。

不久，村里就传得沸沸扬扬了，说有共产党的队伍往南边去了。那种鞋子，是胶鞋，也被人叫做“马克思鞋”。乡下人传得活龙活现，说穿“马克思鞋”的都是共产党，共产党打土豪，把田地分给穷人，他们走的是一条革命路。

这些话像一团火苗在我心中点燃并越燃越旺。我决心丢掉这个家，穿“马克思鞋”，走革命路去！

很快，革命运动在家乡一带也公开开展起来了，村里组织了农会、自卫队。农会不时组织农民游行，高呼“打土豪、分田地”等口号。革命歌曲也流传得很快很广，不仅青年人会唱，连小孩子也会唱几首。我记得我最早学会的是一首《发动歌》，歌词大意是：叫声农友，快快觉醒，为什么世上人吃人，这样不平等？不是命注定，不是我无能，全是统治阶级剥削者一手来造成。叫声农友，快快觉醒，劳苦大众要出头，只有闹革命。大家团结紧，奋起作斗争，一心跟着共产党，才能得翻身。

我自然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很快当上了自卫队员。我也知道，革命是有危险的，弄得不好，不仅解决不了吃饭问题，脑袋搬家也是极有可能的。不久前到七里坪赶集，就见到过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共产党的事情，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他们在倒水河的沙滩上挖个坑，把捉来的共产党员放下去，再用沙埋，埋得人只剩脖颈和脑袋露在外面，然后往沙里浇水，水渗进沙里，越浸沙越紧，人就活活地被窒息了。那些残忍的刽子手如同禽兽，他们把燃烧的纸烟放在被埋的人的耳朵上，烧得皮肉嗞嗞地响，他们则开心大笑。

这一幕惨景，并没有把我吓倒。恰恰相反，我反而从另一角度想了许多问题。革命是怎样一回事呢？那些官老爷和富人为什么这么仇恨革命呢？富人们越是仇恨，就越说明这是桩穷人的事业。还有，国民党反动派拼命地抓呀杀呀，可是，还是有那么多人不顾一切地去闹革命，这就说明，这是一桩了不起的事业。那些死去的人难道不知道革命是要担风险的吗？我想是知道的，知道风险而不畏风险是什么呢？因为

值得,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业。

不能否认,我对党和党领导下的革命,最早曾寄予一种行侠仗义杀富济贫的希望,甚至在我迈上革命之路的时候,也多少有一些行侠仗义的动机,但是,我参加革命的最根本的思想基础还是由于阶级压迫所产生的反抗意识。

参加黄麻起义

一九二七年秋,我盼望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鄂豫皖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安)麻(城)起义。那时候,我虽然还没有机会穿上“马克思鞋”,却毫不含糊地走上了革命之路。

这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我扛着一根红缨枪,跟着本村农会的乡亲们,赶到了首集七里坪。

我已经记不清是谁负责指挥我们了,只记得暴动的口令是“暴动,夺取黄安城!”,暴动的口号是“暴动杀尽土豪劣绅!暴动夺取政权,组成农民政府! 暴动实行土地革命! 拥护中国共产党! 打倒武汉政府! 农民革命万岁!”

当天夜里,我们从七里坪出发,经打鼓岭、火连畈,直达城北三里岗。沿途人山人海,刀枪林立。到了十四日天快亮的时候,我们黄安、麻城两县的农民起义军已将黄安县城围得水泄不通,李先念、詹才芳、吴焕先、王树声等人率领群众,四面出击。

当时的情况,真有排山倒海之势。天快亮的时候,总指挥潘汝忠和吴光浩指挥部队由城北角攀梯而上,一举攻入城内,全歼县警备队,缴枪30余支,活捉县知事贺守忠、司法委员王治平,还有改组委员会的三个人以及十几名土豪劣绅,收缴了